

战略决策中的影响因素

——以汉武帝反击匈奴的战略实践为例*

苗中泉◎

【内容提要】 在战略决策过程中，领导者、官僚组织和社会公众三者的知觉都会发挥作用，在某些情势中更具决定性的是领导者的个人知觉。在汉武帝反击匈奴的历史实践中，武帝的个人战略知觉拉开了对匈奴反击的战略序幕；在先是接连胜利随后接连失利的战略实践中，武帝知觉与帝国行政决策系统认知和社会公共认知各自发生了不同的变化，它们之间相互作用，彼此影响，推动着帝国战略的演化；面对连续失利带来的帝国衰颓，武帝个人知觉的转变在战略的逆转中起到了更具决定性的作用。汉帝国反击匈奴的战略史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战略决策过程中主要影响因素及其相互作用机理的有力证据。

【关键词】 战略决策 领导人 官僚系统 公众知觉 匈奴

战 略决策是国家战略行为中重要一环，是关涉一国平衡自身能力、确立战略目标、有效应对威胁以维护国家根本利益的重大议题，它直接影响着国家战略方针的制定、修正和实施。然而 20 世纪以来的国际政治理论发展集中在各流派之间的相互辩论上，而

* 作者在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罗天虹老师的悉心指导，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卜永光博士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国际政治科学》匿名专家也提出了十分中肯的评审意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当然，文中一切纰漏由作者负责。

《国际政治科学》2013 年第 4 期（总第 36 期），第 89—121 页。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对战略行为的理论化研究不足。其中亟待解决的两个不足,正如左希迎、唐世平在 2012 年年底所概括的那样,“一是缺乏一个理解战略行为的基本逻辑框架;二是对影响战略行为的因素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研究不足”。^① 本文不拟规划一个宏大的战略分析框架,而希望在第二个问题上能有所探求,即集中分析各个因素相互作用机理及其对战略决策的影响。

本文行文思路如下:首先,简单介绍学界关于战略决策影响因素这一议题的既有研究成果。其次,提出主要以认知心理学“刺激—反馈”逻辑为依托,以个人战略知觉、官僚系统知觉和公众知觉三个指标为主要考查内容的战略决策分析框架,分析在长期的战略互动中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第三部分以汉武帝反击匈奴这一长约五十年的战略博弈的历史实践为案例,深入探讨个人战略知觉、官僚系统知觉和公众知觉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相互作用的过程及其对战略决策的影响。最后是对本文观点的总结。

一 既有研究及其对本文的启示

当前关于战略决策议题的研究主要涉及官僚制度研究、公众舆论研究和以决策者个人为对象的微观心理研究。从研究成果来看,多集中在从某一单一视角论述某单个要素对战略决策过程的影响。

(一) 官僚制度与战略决策

从官僚制度视角研究战略决策,主要逻辑之一是将官僚组织视为一个具有独立利益倾向的集团,这一利益集团在国家政策制定中,倾向于维护并扩张其权力、地位或物质报酬。然而资源是有限的,不同部门和不同机构之间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展开竞争,这种竞争波及政策范围,影响最终政

^① 左希迎、唐世平《理解战略行为——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中国社会科学》2012 年第 11 期,第 179 页。

策的形成。^①

希尔斯曼等人的观点与此逻辑大致相同。他们认为，政治决策过程中不同的人和组织拥有不同的权力，组成各个有着自身独立目标的权力中心，例如争取更大的组织权力和良好的生存条件、满足组织成员的个人成就、维系某些意识形态上的信念等。他们尽管对国家目标负有共同责任，但对目标的性质和实现目标的手段看法各异。他们不仅决定自身需要什么样的政策，而且努力寻求将自身希望的政策升级为国家政策。各个权力中心相互博弈，共同作用于政策的制定。^②

学界以上述逻辑及其演绎而来的模型为基本分析工具，进行了大量富有创见的研究。但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当危机突然发生，需要立刻进行重大战略决策时，官僚集团如何能有效地应对，并在相互博弈的过程中形成一种战略方针？显然，在某些情况下，官僚组织、官僚集团并不能迅速展开研究者所设想的相互博弈以影响政策的制定。张星久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皇权与相权的关系时发现，官僚组织往往缺乏一定的灵活性。在紧急情况例如应对大规模战争，需要做出快速反应、灵敏决策时，官僚组织往往显得迟钝、笨拙和运转不灵。此时，君主往往绕开现有的官僚组织和行政渠道，另外组建更为灵活机动的决策中心，从而造成君权与相权的冲突。^③这说明，单纯以官僚制度的视角分析战略决策，是有一定的缺陷的。我们还需要分析其他因素。

（二）公众知觉与战略决策

“知觉”是一个心理学名词，指认知主体对由外来刺激导致的一系列

^① 罗伯特·米歇尔斯认为官僚制是一种保守的政治制度，因为官僚制系统化的政策倾向将不断地趋于保守和增强自身利益。参见戴维·比瑟姆《官僚制》，韩志明、张毅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第45—49页。

^② 罗杰·希尔斯曼、劳拉·高克伦、帕特里夏·A. 韦茨曼《防务与外交决策中的政治——概念模式与官僚政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第127页。

^③ 张星久《中国君主专制政体下的君权与相权冲突——兼论官僚组织与君主专制制度的关系》，《求索》1998年第2期，第114—120页。

感觉所进行的组织和解释的过程。对客观事物个别属性的认识是感觉,对同一事物各种感觉的结合,就形成了对这一事物整体的认识,也就是形成了对这一事物的知觉。公众知觉可以界定为社会公众对某一事物或者事情的整体认识。

到目前为止,学界尚没有关于公众知觉与战略决策之间关系的具体研究成果。但我们可以变通地视公众舆论为公众知觉的一种社会表现,因为公众舆论直接体现了社会公众在一定时期内对相关议题的知觉。学界关于公众舆论与战略决策的成果则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将公众舆论纳入战略决策的影响范畴只是近代大众政治兴起之后的事情。随着市民社会的发展、个人权利的完备和传媒工具的进步,公众舆论愈来愈显示出对国家战略决策的重大影响。希尔斯曼等人将公众舆论视为权力政治过程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层次,指出“尽管公众舆论不是一个权力中心,但是公众的意见看来是能够影响决策的,至少那些参与决策的权力中心要考虑公众的意见”。^①王鸣鸣认为,随着自由主义的发展和分权的兴起,公众舆论对国家战略决策的影响将越来越大。例如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国内反越战舆论的高涨迫使美国不得不做出从越南撤军的决定。^②

但对公众舆论在战略决策中的作用,不同学者观点不同。摩根索和利普曼认为民意能够影响决策,但限制了决策者做出明智选择的自由。摩根索认为“理性的外交政策从一开始就不能指望大众的支持,因为公众的观点常常是非理性的。”“大众的选择会为了今天的好处而牺牲明天的利益。”民众对事件的反应速度和缺乏相关的知识会威胁任何一个用民意指导外交政策的国家的长远利益。他说“不幸事实表明,在重要历史关头,最广泛的民意往往最具有破坏性。他们会使知道如何明智行事的政府瞻前顾后、优柔寡断,和平的政策过于和平,战争时期过于战争,要么姑息纵容,要么冥顽不化。”托马斯·贝利和盖布利尔·阿尔蒙德所进行的

^① 罗杰·希尔斯曼、劳拉·高克伦、帕特里夏·A. 韦茨曼 《防务与外交决策中的政治——概念模式与官僚政治》,第 372 页。

^② 王鸣鸣 《公众舆论与美国对外政策》,《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 年第 5 期。第 78 页。

大量社会调查也支持上述观点。^①

在这些关于公众舆论与战略决策的研究中，他们都将公众舆论视为一个不变的具象，从而静态地探讨公众舆论对战略决策的影响，然而公众舆论进而是公众知觉，是一个与实践紧密相关、随时变动的因素。尤其是随着战略实践的深入，公众知觉会发生重大的、与实践相关的变化。这需要我们以更加复杂的方式看待公众知觉对战略决策的影响。

（三）决策者个人与战略决策

从决策者个人的角度，分析其特有的素质、能力、性格等因素对战略决策的影响，这是政治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它主要可以分为心理分析派、个性分析派和认知心理学派三个流派。^②近年来颇有影响的当属认知心理学派。这一流派发扬了国际政治心理学关于领导人对战略决策具有决定性影响的观点，认为领导人的战略决策是其信念和观念在特定情况下的自然反应。领导人在接受外界信息时，其信念体系对外界环境信息的处理和政策制定有三个方面的影响：印证性效应、指导性效应和学习效应。首先，领导人制定的政策会反映和回应外界战略环境，这体现了信念体系的印证性效应。其次，在接受外界信息后，领导人可能在信念体系的引导下，针对信息做出判断，采取战略决策，从而引导事件的发展，这就是指导性效应。最后，领导人可能会根据以往的经历和历史实践，与现实进行比较，通过类比或者学习历史经验，制定出反映信念体系学习效应的政策。领导人的信念体系是沟通领导人与外部环境的桥梁。因此分析领导人的信念体系是理解和预测国家政策取向的关键。国家战略决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人如何理解和回应外界信息。^③

自从20世纪70年代认知心理学被杰维斯引入国际政治分析后，这一

① 王鸣鸣 《公众舆论与美国对外政策》，第77页。

② 关于国际政治心理学各流派的系统阐述，可参见张清敏 《国际政治心理学的流派分析》，《国际政治科学》2008年第3期，第71—101页。

③ 冯惠云 《防御性的中国战略文化》，《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4期，第5—6页。

流派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然而正如秦亚青批评杰维斯分析成果时所指出的那样,政治领域的认知心理学分析往往过分关注个人认知而忽视社会系统、文化背景等因素对个人和决策系统的塑造,而后者往往直接构成了个人认知的观念基础甚至直接对其加以塑造,对此过分关注与过分忽视都是不可取的。我们需要有一种综合性的研究思路。

上述三个视角的研究成果从不同层面描述了战略决策过程中主要影响因素发挥作用的细节。但是整体上存在两方面的不足。一是大部分研究对战略决策的动态特点关注不够,更多的研究者将战略决策过程视为一个静态的、受某一因素或者某些因素影响的静止的模型,这与现实中的战略实践根本背离。二是多数研究者侧重于泛泛列举影响战略决策的要素。而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是,在战略决策的动态过程中,各个因素之间是如何作用于战略决策之形成的?各个要素之间又如何相互影响?这又如何影响到战略决策的最终形成及其修正?对第一个问题,学界已经有各种视角的研究,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则是本文的核心关切。

二 战略决策的分析框架及其演绎

战略是关于目标、手段和能力之间的审慎的平衡。这一定义首先阐明了战略思考的三个基本内容,即目标如何界定、手段如何选取、能力如何评估。在战略决策过程中,决策者或者决策系统始终无法回避的问题是,谁是主要威胁?如何消除威胁?这需要一个合适的、系统的分析框架。

关于国家如何辨认威胁并消除之的问题,认知心理学认为,当一个人接受信息或者受到环境因素刺激时,就会产生对刺激的知觉并根据自己的理解做出反应。^①据此,上述问题的答案由两个部分构成。一是外部刺激,它形成一国对外决策最直接的动力。在不考虑国内因素的情况下,可

^① 参见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译者前言部分第13页。更详细内容,参见理查德·格里格、菲利普·津巴多《心理学与生活》,王垒、王甦等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第102—132页。

以设想，一个没有任何外部刺激、不受任何外部威胁的国家，基本上不会采取应对刺激和威胁的行动。相反，一个饱受外来威胁的国家，其国家精力必然要大幅度投放在应对外来威胁上。外来威胁越大、越频繁，国家投入的精力就越多。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简化地认为，外部刺激的强度和频率与战略行为体反应的激烈程度正相关。二是内部反馈，即战略行为体内部对外部刺激进行加工、认知的过程。

左希迎和唐世平在他们的研究中，将战略行为分为战略评估、战略决策、战略动员、战略执行四个阶段，并明确提出，在战略决策阶段，决策者（领导人）、不同部门和团体例如外事部门、军方、利益集团、媒体、公众声音等成为影响决策结果的核心要素，而国家官僚体制只是起到辅助或者侧面作用。^①他们认为，决策者与其他部门和团体在战略决策中起着核心作用。我们对此进行一个小的修正，将其他部门和团体分为中央行政官僚系统和普通社会大众。其原因在于，中央行政官僚系统既会影响战略决策的结果，也会直接影响到战略的执行，同时，中央行政官僚系统往往与决策者接触的机会更多，彼此相互影响的可能性也更大。普通公众则对决策者表现出弱小得多的影响力。此外，根据阿尔蒙德的研究，公众知觉具有一定程度的非理性特点，当决策者和中央行政官僚系统关于战略决策的认知发生分歧时，公众知觉会成为干扰二者互动的重要变量。

我们可以将影响国家对外部刺激做出反馈的内部要素提炼为决策者个人的战略知觉、中央行政官僚系统对刺激的知觉和社会公众对外部刺激的知觉三个层次。这三者与前述外部刺激的两个变量一同构成如下战略决策分析框架（见图1）。

在这个框架中，A部分构成行为体产生知觉并做出反应的外部刺激因素，刺激强度和刺激频率是分析这种刺激的基本指标。B部分列出了行为体内部影响其做出有关反应的三个层次。A和B共同组成认知心理学中的“刺激—

^① 左希迎、唐世平 《理解战略行为——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第18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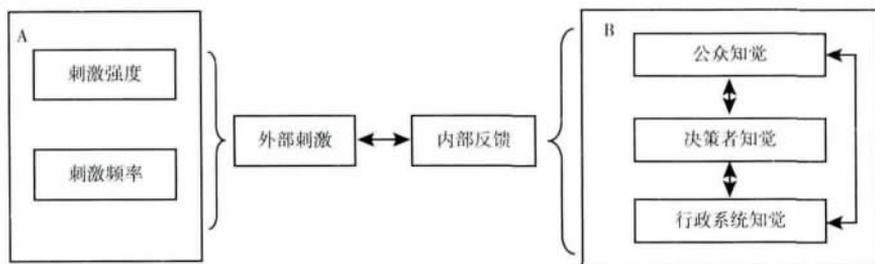


图 1 战略决策分析框架

反馈”模式。如果将 B 部分视为单一机体，即把受到刺激的行为体视为具有简单理性的黑箱，而不去考虑刺激发生后行为体内部的复杂反应，则显然外部刺激强度越大、频率越高，行为体对刺激的反应就越激烈。

但在历史和现实中，被刺激行为体不可能永远团结如一，不可能没有内在各部分的独立反馈。B 部分中的三个因素必然会在与外界的战略互动中发挥复杂的作用，做出自己的独立反馈并彼此作用，共同影响行为体整体上对刺激的反馈。就战略决策主体而言，B 部分内部的知觉显然要比 A 部分更能影响决策的结果。战略行为体内在各层次对外在刺激的反应要比单纯的外界刺激更能决定战略决策。为此，我们的分析重点应该是 B 部分中各层次之间的互动关系。

设定 A 部分为常量，那么，B 部分中的各层次知觉分别单独与战略决策结果呈正相关关系。即：（1）如果行为体内部公众知觉认定外部刺激是一种无法接受的赤裸裸的挑衅，那么该行为体针对外来刺激采取敌对行动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反之亦然。（2）假如行政系统对外部刺激非常敏感，那么做出冲突性决策的可能性也会增大。反之亦然。（3）假如核心决策者倾向于以武力应对外来刺激，那么在外来刺激的作用下，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就会上升。反之亦然。

当 B 部分中各层次之间发生互动时，三个层次如何共同作用于战略决策呢？

认知心理学认为领导人对国家政策制定具有决定性作用。^①因而核心决策者的知觉比公众知觉和行政系统知觉能更大程度地影响战略决策的结果。但是当这三个因素相互作用时，我们有理由认为决策者知觉与战略决策之间的关系要更为复杂。因为随着战略决策的展开和战略实践的深入，阶段性战略结果会对长远战略发展产生难以预料的影响。

其一，如果阶段性战略实践以失败为主，或者面临连续的失败，则领导人威望不断下降，行政决策系统内部和社会大众会不断寻求修正统治者的个人知觉甚至与之对抗，由此造成一种结果，即统治者要么修正其知觉进而修正或者改变战略决策，要么一意孤行以至于倒台。在这种情况下，行政系统和社会大众的知觉可能逐渐占据上风，并继续发挥作用。

其二，如果阶段性战略实践以胜利为主，或者取得连续的胜利，则领导人个人知觉被证明为正确，其威望不断上升，来自行政决策系统和社会公众的支持也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新支持者转变原有知觉，向领导人知觉靠拢。于是领导人的个人知觉开始蔓延为行政决策系统和社会公众的自觉意识。长此以往，B部分中的各个层次知觉趋于一致，基于领导人知觉的战略决策成为整个战略行为体上下一致的共同选项，并得以长时间有效执行。由于领导人对决策的巨大作用，能够对这种情况下的战略实践做出重大调整或者根本转变的只能是领导人自己。然而这样的转变并非毫无代价：或是巨大的战略成本令领导人不得不重新审视既定战略；或是领导人更迭，继任者出于各种原因改弦更张。

其三，如果战略实践先是以阶段性胜利为主，继而开始连续性失败，则会在战略行为体内部形成分化。一方面是战略后果直接承担者，即普通社会公众基于战略实践的成效而形成的知觉开始与领导人知觉之间出现张力，并随着战略实践的连续失败而趋向于反对领导人甚至与领导人对抗。另一方面，在行政决策系统内部也发生分化，基本上会出现两种对领导人知觉大相径庭的态度。一部分行政人员由于战略实践的失败而建议甚至要

^① 冯惠云 《防御性的中国战略文化》，第6页。

求领导人改弦更张,另一部分人员则会基于战略实践初期的阶段性胜利,强化对领导人权威的认同,进而强化对其既有知觉从而是既定战略决策的支持。由于后一部分人大抵上也是早期战略决策的积极执行者,在战略实践中可能产生或者扩大了其特殊利益(诸如权力、地位、社会威望、财富等)。于是杰维斯所谓的经常出现的错误知觉就将发挥作用,^①使他们更倾向于将战略失败归咎于战略决策之外的因素,从而认定“墨守成规”要比“改弦更张”更有利,进而更坚定地支持既定战略。由此,行政系统内部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两种对立知觉,这可能引发行行为体决策系统内部的对立和纷扰。而能否结束或者有效驾驭这种局面则取决于统治者的战略素养。

以上是我们对战略决策过程中决策者个人、行政决策系统和社会公众三个层次知觉相互作用及其对决策后果影响的一种理论演绎。下面我们将通过汉武帝对匈奴的战略实践对此进行具体、深入的探讨。之所以选取汉武帝反击匈奴的战略实践作为研究对象,原因在于:(1)武帝对匈奴的战略决策鲜明地表现出决策者个人(皇帝)、行政决策系统(西汉帝国的官僚体系)和社会公众(文人儒士、普通百姓等)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2)武帝反击匈奴的战略实践殊为漫长,从其即位不久直至去世,长达五十余年。这一较长时段足以为我们提供充分的可资研究的史料。(3)武帝反击匈奴的历史极具特色,从最初武帝即位时汉帝国对匈奴的绝对优势局面到武帝去世时双方僵持、出现所谓汉匈“和亲”局面,汉帝国对匈奴的战略目标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有助于我们理解和分析,在这个过程中,各层次的知觉对相关决策的改变所起的作用。(4)汉武帝时

^① 杰维斯认为由错误知觉导致的错误判断几乎是无法避免的。而根据秦亚青对杰维斯成果的总结,主要的误判有:1. 国家决策者往往会将对方想象为内部团结一致、令行禁止的行为体。这样一来,任何无意的、巧合的、偶然的事件都会被看作是精心策划的战略行动。2. 决策者往往过高估计自己的影响力和被影响的程度。如果出现有利于自己的情景,决策者会认为是自己的影响所致。一旦出现不利结果,则会认为这是敌方的敌意预谋,与自己的行动没有关系。3. 愿望思维。决策者在接受信息时往往希望听到那些符合自己愿望的消息,而排斥自己不愿意听到的事情。4. 认知失调。当对同一件事情发生认知分歧时,决策者往往会为了保持自己的认知相符,而千方百计地寻找理由,自圆其说。参见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第13—15页。

期乃是中国历史进而可谓世界史进程中最富转折意义的伟大时期之一。武帝时期的汉帝国从帝国统治形态的初步完善到社会意识形态的重新塑造、确立，再到民族意识、民族认同的逐渐形成和稳定，经历了长期的变化。考察这一大变革时期的战略实践，无论对理论研究还是当下现实，都具有深远意义。

三 史例分析：汉武帝漫长的战略实践

由于我们要考察的战略历史长约五十年，一个合理的分析方法是以时间为主线，分成若干个重要的阶段，分别探讨各个阶段中汉武帝个人知觉、中央行政官僚系统知觉和社会公众知觉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对战略决策的影响。

（一）三大变量的具体内涵及西汉决策体制

显然，个人知觉指的是对当时战略决策具有核心影响的汉武帝个人认知以及基于其所受教育、训练而养成的独特的个人偏好。

在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中，中央行政决策系统一般而言指的是以丞相为核心的、处理中央行政事务的官僚体系。具体到汉武帝时期，就是指除了武帝之外的以相权为核心、以技术官僚为依托的行政决策系统。西汉在中央实行“三公九卿”制度，“三公”分别是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作为百官之首的丞相，位高权重，佐助皇帝处理全国的政务，有权参与国政的决策，考课群臣，制定法令。丞相在皇命决策过程中可提出自己的观点。在汉初，丞相不但自己可以决策一定的行政事务，还直接统辖百官。丞相府作为一个独立的机构，有着众多属吏，分管全国的繁多事务。太尉为最高武职，同时也是皇帝的军事顾问，位在丞相之次，负责处理日常军事事务，但不行军令之权。御史大夫一般由皇帝的书记人员发展起来，主要职权是监察，典正法原，同时也有谏议的义务，通过搜集庶言、评议朝政的方式，辅佐丞相统理天下。御史大夫管理着国家的文书、国籍，也负责诏

令的起草,是决策程序的最后一个环节。^①

公众知觉指的是普通社会大众的知觉意识。由于汉朝时不可能有独立的民意调查,根据中国社会尊贤的传统,除了史籍中明确记载的公众意向之外,我们还可以用具有很大社会影响的文人儒士的意见和当时民间流传的广受推崇的诗歌、文章以及“非吏而得与吏比肩”的“三老”的态度来推测公众知觉。^②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背景因素是西汉时期的战略决策体制。根据柳正权的研究,在秦朝及汉初,重要的决策都是在皇帝主持的会议下制定的,由百官公卿对具体的制度进行议论,并形成意见,最终由皇帝决断,朝议是皇帝决断前的重要程序。他发现,秦朝及汉初有两个中央决策机关:一个是以皇帝为核心的最高决策机关,另一个是以丞相为主要决策人的丞相行政体制。皇帝召开御前会议,将问题、事由交会议讨论,形成建议,皇帝根据这些建议,做出决策,交给丞相,经过丞相副署,由具体的行政部门颁行实施。皇帝如不需要征询意见,直接决策后交由御史府起草其旨意,以诏令的形式下达给丞相府,由丞相负责实施。丞相在接到奏报后,可以召开外朝会议,与相关官员共同讨论。为此专设百官朝会殿,用于百官朝议,形成决策。并由其属官——长史起草,交由相关行政机关执行。地方或相关行政机关的奏报,是呈交皇帝决策的,丞相在收到奏报后,应由皇帝做决策。^③在整个决策过程中,无论是皇帝决策还是丞相决策,起主要作用的都是皇帝和行政决策系统,而社会公众基本上只能通过间接渠道影响皇帝或者丞相决策系统而起作用。

① 参见庄春波《中国历代军事制度概述:两汉军事制度概述》,《历史教学》1989年第10期,第13—14页。

② 牟发松认为,“三老”是汉代国家认定的社会领袖,他们在国家和社会之间扮演媒介和缓冲角色,在乡村中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和示范效应,对于汉朝国家权力顺利有效地渗透到基层社会,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他们常就朝廷大事、地方政治特别是官员的去留,提出意见,往往能够得到当局的重视。参见牟发松《汉唐历史变迁中的社会与国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第235—236页。

③ 柳正权《中国传统行政程序研究》,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第45—47页。

（二）武帝反击匈奴战略的初步制定

武帝执掌帝国时，汉已立朝六十余年。六十多年中，除了景帝时期的诸侯叛乱（很快即被镇压）外，帝国基本上没有大的战争。统治者崇尚黄老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实行“与民休息”的经济政策，官民关系相对融洽，社会矛盾较为缓和。六十余年的发展为初即位的武帝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史记》记载，仅京师钱便“累巨万”，府库充盈，家给人足，太仓粮库堆积的粮食甚至腐烂，牛羊遍地，马匹成群。汉帝国已经拥有了开疆拓土的战略潜能。

与此同时，这个中原王朝也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北方日益强大的匈奴帝国的战略逼迫。其一，匈奴从三面对汉帝国形成了地缘政治上的战略合围。匈奴在单于冒顿的领导下，趁中原地区战火纷纷之际迅速扩张，到武帝时期，已经成为从甘肃临洮过代地至东海一线以北地区最强悍的马背民族，史称“控弦之士三十万”，这些“控弦之士”的战略机动性很高，“如飞鸟走兽于广袤”，“往来转徙，时至时去”。^①至武帝初年，匈奴部族已经控制了整个大漠草原，并将势力西进至天山一带，扼河西走廊，东抵大洋之滨，全面包围右北平，直迫长安，从西北、正北和东北三面形成对汉室的压制与包围。其二，匈奴常有“南下”之心，不断骚扰汉室边境。从公元前200年至公元前142年，近六十年间，史料可查的匈奴进攻汉边疆的记录就有十六次。^②每次战况不一，但大多以匈奴杀人、掳人、抢货物甚至毁城之后撤退为结局。汉室则或是在大规模军队调动之后因为匈奴高超的机动性而徒劳无功，或是因为顾及其他而干脆直接以和亲处置（见附录图2）。贾谊因此叹息汉帝“以帝皇之号为戎人诸

^① 《汉书卷四十九·爰盎晁错传》。

^② 中国军事史编写组编纂的《中国历代战争年表》中历次大规模战争共计12次（见文后附录表1）。此外，另有4次仅有匈奴犯汉，而没有汉军大规模反击的记载。参见中国军事史编写组《中国历代战争年表》（上卷），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3，第160—165页。

侯”。^① 其三，匈奴的强大及其对汉中央王朝的威胁给了汉帝国内部有异心者反叛的机会。汉文帝时，济北王听说皇帝要往北方巡视边境，抵御匈奴，想要趁机谋反。王朝诸侯王每每作乱，大都与北方匈奴暗中结成同盟，严重威胁汉王朝中央统治。“公元前 155 年，中央政府肯定意识到一种潜在的危险，某个反叛的王国完全可能在向汉帝挑战时说服匈奴与之合作。”^② 《史记》中也记载“孝景帝立，赵王阴使人入匈奴。吴楚反，欲与赵合谋入边。”^③

尽管如此，反击匈奴仍非汉室君臣上下一致的选择。六十多年中汉帝国一直坚持对匈奴实行“和亲”政策，以美女、财物换和平。甚至面对匈奴单于对吕后的侮辱，汉也是以“谦卑”态度甚至不惜“称臣”以平息之。对匈奴只可防御不可进攻，这甚至已经成为武帝初期中央官僚们的惯性认识。史载武帝即位初年，曾下诏廷议对匈政略，以韩安国为代表的高层官僚认为攻伐匈奴是以“天下之力满足一人之欲”，强烈反对反击匈奴。^④ 究其原因，一是长期和平红利使其丧失了挑战匈奴的欲望与决心；二是汉军在防御匈奴战争中接连失利，使其缺乏挑战匈奴的信心；三是匈奴领地多为大漠草原，与汉人农耕环境极为不同，即便征伐，所得疆土也不能用于耕作，被包括士人在内的多数人认为于国无益；四是帝国黄老“无为之治”的意识形态灌输使其面对外来威胁时易于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如汉帝宗室刘安对待胡越相攻、挑衅汉廷威严时的态度，便可从侧面颇具特色地反映出秉持黄老学说的汉家天下对匈

① 《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

② 崔瑞德、崔鲁一编《剑桥中国秦汉史》，杨品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第 168 页。

③ 《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第五十》。

④ 韩安国曾经做过地方郡国的丞相，在武帝朝担任司农、御史等职，位列九卿。他的态度代表了很大一部分政府官员的认知，同时也表明了长期以来汉帝国政府决策系统对匈奴威胁的态度。在廷议上，他公开宣称：“……平城之饥，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及解围反位，而无忿怒之心。圣人以天下为度者，不以己私怒伤天下之功……夷狄非威不能制，强弗能服也，以为远方绝地不牧之民，不足烦中国也……使边郡久废耕织，以支胡之常事，其势不相权也。”见《汉书卷五十二·爰田灌韩传》。

奴南下的认知。^①

然而汉武帝并非一个守成之君。早在先皇景帝时期，汉帝国内儒家思想已经开始复兴，并且有诸如卫绾、赵绾、王臧等儒生进入帝国高级行政系统担任重要职务（分别任太傅及丞相、御史大夫、郎中令），而如窦婴、田蚡一类对皇帝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外戚，也十分推崇儒术。^②这使得儒家思想这一积极进取、主张以王道实现天下大一统的意识形态能有机会影响并塑造武帝的思想偏好。同时，我们也可推断武帝至少也接受了申商法家王霸思想的教育，崇尚武力征伐。^③此即所谓“儒法并重”。这就必然导致其对待外来刺激的知觉与帝国技术官僚系统的知觉不一致。试看武帝即位之后的施政诏书：

① 刘安在武帝将要发兵攻南越时上书言道“自三代之盛，胡越不与受正朔，非强勿能服，威弗能制也，以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烦中国也。”“天下赖宗庙之灵，方内大宁，戴白之老不见兵革，民得夫妇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夷狄之地，何足以为一日之闲，而烦汗马之劳乎？”见《资治通鉴卷第十七·汉纪九》。

② 黄留珠认为，黄老学说之所以在汉初盛行，关键原因在于汉朝统治者内部之间的斗争过于激烈，功臣旧部为了明哲保身而选择了黄老无为的学说，以至于像曹参、爱盎这样的人才当了过于强势的皇帝或者王侯的丞相或相国之后，往往选择纵情于酒以保身。他同时认为景帝及诸窦没有一个是真正崇尚黄老学说的。武帝独尊儒术之前，汉王朝真正实施的是百家之说。详见黄留珠《秦汉历史文化论稿》，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第318—331页。据史书记载，窦婴在景帝时为大将军，田蚡为中大夫。窦婴政治影响力尤其显著。“每朝议大事，列侯莫敢与亢礼。”武帝初即位时，窦婴与田蚡分别为丞相、太尉。而“婴、蚡俱好儒术，推轂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窦太后好黄老之言，……乃罢逐绾、臧，而免婴、蚡。……蚡虽不任职，以王太后故亲幸，数言事，多效。”见《汉书卷五十二·窦田灌韩传》。

③ 虽无直接材料明确显示武帝少年时所接受的具体教育内容，但史料记载，武帝即位之后，外事四夷之功，征伐烦数，重用酷吏。任用张汤、赵禹等人，“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汉律令骤增至“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甚至出现法律文书堆满文案，刑典看不过来的情形。对内制定烦琐法典，以法治国，重其罪；对外不惜劳民伤财，热衷于武力攻伐，开疆拓土，这正是申商法家学派的主张。其中商鞅学说尤其重视以严刑酷法治国，动员全部力量征伐。因而可以判断，作为具有雄才大略的一代帝王，武帝至少了解并接受了申商法家学说。到汉宣帝时，太子（即汉元帝）劝宣帝大用儒生，认为宣帝“持刑太深”，宣帝很生气地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宣帝之前汉昭帝在位十四年，以武帝晚年重臣霍光全面主持政务，制度无建树。由此可以推断，宣帝所谓“汉家自有制度”，必然形成于武帝时期。而武帝也曾对卫青说“汉家庶事草创，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见《汉书卷二十三·刑法志第三》《汉书卷九·元帝纪第九》《资治通鉴卷第二十二·汉纪十四》。

朕闻昔在唐虞，画像而民不犯，日月所蚀，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措不用，德及鸟兽，教通四海。海外肃穆，北发渠搜，氏羌徕服。……今朕获奉宗庙，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渊水，未知所济。欷与伟与！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朕亲览焉。^①

诏书内容很明确。除了创建汉家王道制度之外，皇帝就是要征伐四夷，开疆拓土，威服海内。对比其祖汉文帝诏书“朕既不能远德，故惘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设备未息。今纵不能罢边屯戍，而又饬兵厚卫，其罢卫将军军。太仆见马遗财足，余皆以给传置”^②和其父汉景帝“尊业”“务在养民”的诏令，显然武帝在对世界的认知和追求上与前辈及其遗留下来的官僚系统存在根本不同。

汉武帝要积极作为，用兵四夷，在当时至少有南下与北上两个战略方向可供选择。其中南下即是进攻南越、西南夷等，开拓东南部、南部、西南部疆土；北上则是进攻匈奴，消除匈奴对汉室的威胁。汉武帝第一次出击选择了南下，平定闽越对东瓯国的袭扰。显然，在这次出击中，武帝意志并没有得到官僚行政系统（由窦太后支持）甚至“好儒”的太尉田蚡的认可，军队并非以代表国家意志的“虎符”征调，而是由武帝个人的使节逼迫地方太守出兵。此次出兵以闽越兵主动撤退告终。事实上，武帝选择南下，并非明智之举。一是南方自然环境不适合当时汉军主力（以步兵、车兵为主）作战。二是南方诸政权虽势力不小，却并没有对汉构成直接威胁，南下并非当务之急。三是帝国南部诸侯仍对中央怀有异心，大规模南征很可能使其趁机坐大，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四是南下属于开疆，北上则含有雪耻的意味。并且，北上用兵，一则可以雪洗六十年来自匈奴对汉廷的侮辱；二则可以消弭匈奴骑兵对北地边境长年不断的骚扰，维

^① 《汉书卷六·武帝纪》。

^② 《史记卷十·孝文本纪第十》。

护正常的生产秩序；三则可以解除匈奴对汉帝国的战略包围，改善帝国安全形势；四则可以开疆拓土，恢弘王道。于是不久之后，当匈奴再次入侵帝国时，武帝便准备彻底扭转帝国对匈奴的隐忍战略。

已经拥有反击匈奴战略潜能的武帝不可避免地与官僚决策系统发生了观念上的分歧，于是，汉王朝展开了一场关于匈奴战略的大辩论。

熟悉匈奴人生活习性的雁门人聂壹借助大行——“大行”是使者的意思——王恢向武帝建议伏击匈奴。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聂壹的身份。他并非是汉王朝的官僚，也不是读书人，而是一个生活在汉匈战略对峙最前沿的边民，史料称之为“雁门马邑豪聂壹”。从汉兴至此，近六十年中，匈奴在汉帝国北疆数千里的范围内，大小寇边 29 次，^① 汉庭少有有效的防御对策。每逢匈奴袭扰，边城多被屠掠，“以骑驰蹂而稼穡耳”，^② 边民大受其害，自太守、都尉以下，数以千计万计人被杀戮。^③ 匈奴给汉帝国带来的灾难，边民是直接承受者。在这样的外来刺激之下，边民聂壹向皇帝进言改变和亲政策、伏击匈奴，当然是理之必然。

聂壹的建议与皇帝的意图不谋而合，皇帝因而在廷议上十分明确地宣布自己的倾向“单于侵盗无已，边境数惊，朕甚悯之，欲举兵攻之。”韩安国坚决反对。他的理由主要有三条，一是汉朝高皇帝和文皇帝都坚持对匈奴和亲政策，天下宴安六十年，武帝应该遵守之；二是匈奴与汉人生活习性、文化制度完全不同，没有征伐的必要；三是汉军与匈奴作战没有必胜的把握，反而有战败的可能。韩安国的见解并非毫无可取之处，至少就最后一条而言，可谓切中肯綮。与韩安国针锋相对的是大行王恢提出的反击匈奴策略，这显然也与他的大行身份相关。这个身份使他能够深入匈奴内部，观察匈奴实情，思考应对匈奴之策；同时，通过《史记·匈奴列传》中匈奴单于发给汉皇帝的信的言辞来看，我们能够推测出大行王恢在出使

① 参见陈晓鸣《两汉北部边防若干问题之比较》，载方志远等《国家制度与古代社会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第280页。

② 《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第五十》。

③ 详见附录。

匈奴时可能受到的“礼遇”。反击匈奴，很可能也是王恢对与匈奴的长久接触中所受到的不太友好的待遇做出的一种自然反应。王恢回击韩安国的理由也是三条，一是当今帝国财物丰盈，有反击匈奴的实力；二是匈奴连年寇边，边境数惊，乃仁人之痛，而对待匈奴，只能威服不能仁蓄；三是尽管汉匈之间军队主战方式不同，但汉可以扬长避短，以利诱匈奴，重兵伏击之。武帝最终支持了王恢，“乃从恢议”。^①

在这场辩论中武帝更像一个旁听者，既有的史料中并没有武帝耐心说服众大臣改变既有认知的记录。但这场辩论是由皇帝的诏令“朕欲举兵攻之”而引起的。所以，实际上皇帝是这场辩论的总发起者。以大行王恢及其身后的边民聂壹为代表的边境社会公众知觉支持了皇帝的意图，而帝国传统的官僚政治系统则依旧反对。此后我们能够看到武帝为实施这种新的战略做出的努力，即削弱反对进攻匈奴的行政系统权力，另外搭建一个能够忠心执行自己战略意图的班子。

首先是通过征召贤良文学组成内朝参与政治决策，将以丞相为首的官僚决策体系权力逐渐剥夺，形成内外朝制度。后来丞相率领的外朝竟然仅成了内朝决策的执行机构。参与内朝决策的官员大多品级较低，人微言轻，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仅是皇帝决策的参谋。^② 由此皇帝成为朝廷决策的最高和唯一权力者。汉初丞相权力无限大、皇帝不过问国家具体行政事务的局面发生逆转。^③ 其次是不断提高将军政治地位，将大将军、大司马等

① 关于廷议辩论的细节，见《汉书详节·韩安国传》。

② 据柳正权研究，为削弱相权，汉武帝一方面从布衣儒生中选择文士，以侍从身份出入宫禁，称为中朝官，与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官相对。另一方面，将自己难以应付的大量文书交给尚书处理，并令侍从负责皇帝与外界沟通。外朝文官政府的决策权由此被削弱，皇帝独裁加强，而以尚书为决策核心的一个新的决策机制建立起来。尚书、侍中们既是皇帝决策过程中的参谋人员，又是皇帝做出决策后负责起草诏书、诏令并送交外朝实施的人员。参见柳正权《中国传统行政程序研究》，第46页。

③ 汉兴以来直至武帝朝，丞相“掌丞天子，助理万机”，“入则参对而议朝政，出则监察而董是非”，掌握着朝廷实权。官吏任免、政务处置甚至法律制定皆决于丞相。史载景帝想要立皇后兄王信为侯，终因丞相周亚夫的反对“默然而止”。详见《汉书卷十九·百官公卿表》《后汉书卷四十六·郭陈列传》《资治通鉴卷第十六·汉纪八》。

引入内朝，参与军国决策，由此皇帝直接掌控了军队，太尉日渐虚设，后竟被废除。汉帝国以帝权系统为核心的战略决策体制逐渐形成，武帝的个人知觉因此得以毫无掣肘地作用于战略决策。公元前133年，武帝采纳王恢建议，征调三十余万汉军开始以“诱使伏击”的方式第一次主动攻击匈奴。从此之后，“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寇于汉边，不可胜数”。^①

综上所述，在做出反击匈奴这一战略决策的过程中，决意要对匈奴的挑衅实施大规模报复的观念一方面来自武帝既有的开疆拓土的偏好，另一方面来自普通边民对匈奴寇边灾难的痛苦反馈，此两者的知觉叠相重合，共同推动了反击匈奴战略的出台。而与此持相反态度的行政官僚系统则被武帝以机构改革的方式架空。在此过程中，个人知觉显然起了启发性作用，并由于公众知觉的支持而变得更具决定性。

（三）反击匈奴战略实施的全盛时期

王恢反击匈奴的谋略并没有成功，三十万汉军的伏击最终一无所获。但此后二十年，汉军对匈奴坚持进攻战略，再无重大失败。这二十年，是武帝武力反击匈奴的全盛时期，也是武帝反击匈奴战略的连续胜利时期。

王恢谋略的失败源自汉军与匈奴骑兵建军基础的迥异。汉军以步兵、车兵为主，兼有部分骑兵，而匈奴则全部为骑兵，双方机动性不可同日而语。若要继续实施对匈反击战略，武帝首先必须革新兵种。以帝国“阡陌成群”的马匹为基础，至迟在公元前128年，汉军（至少是帝国北方汉军）已被改组为以正规化的骑兵部队为主，辅以车兵和步兵及其他兵种的强大军事部队。其中，骑兵部队根据马匹质量的高低分为骠骑、骁骑、车骑、骑将军等不同级别，出征时有一定的规模建制，作战时有固定的作战队形，后世研究者认为相对于匈奴的“逐利如鸟集，因败如云散”

^① 《资治通鉴卷第十八·汉纪十》。

而言, 汉家骑兵军团已经非常正规。^① 其次必须选拔骁勇将士。武帝不拘一格, 大胆起用经过实战检验的年轻将领, 卫青、霍去病、赵信、公孙贺等名将得以拔擢。他下令挑选北方六郡良家子弟入羽林, 习骑射; 并在长安不惜大费周折移民, 划出上林苑, 作为羽林骑射的场地, 亲自带领羽林将士游猎其中, 借以增强其骑射作战能力。正是这样一支汉军骑兵团, 才保证了此后汉军在漠南、漠北、河西等历次主动出击匈奴、进行主力决战行动中的完胜。

汉对匈奴的战略全胜是势之必然。首先, 汉对匈奴在战争潜能上拥有绝对优势。西汉人口在景帝末时已经达到 3400 万, 而全民皆兵的匈奴总人口不过百万。汉中央有效管辖疆域虽未必一定有如匈奴辽阔, 却在物资生产、税收等方面的制度上建树远远超过匈奴。铁制武器的大规模使用则保证了汉军处于当时武器装备的最前沿。其次, 汉实施了正确的伐匈方略。武帝采纳主父偃建议, 屯田实边, 以朔方郡为前进基地, 延伸了汉军战略前线。因此, 即便漠北大决战之前汉已有数次大规模出塞进攻匈奴的消耗, 却仍然可以通过稍稍“征发”之后实现“匈奴远遁、漠南无匈奴”的胜利。

反击匈奴的战略胜利改变了朝廷官僚决策系统的既有认知。基于皇帝先前的知觉和偏好制定的政策经过连续胜利的实践证明为正确之后, 开始演变为官僚决策系统的普遍知觉。我们可以从主父偃、公孙弘等人的转变上找到明显的证据。

主父偃曾学百家之言, 北游各国。元光元年, 卫青将他举荐给皇帝。主父偃给皇帝上书谏伐匈奴事, 认为“怒者逆德也, 兵者凶器也”, “圣王重行之”; 告诫武帝“务战胜, 穷武事, 未有不悔者”。他认为秦始皇使蒙恬将兵北击匈奴, 最终导致了秦政权的覆亡, “边境之民糜闭愁苦, 将吏相疑而外事”, “兵久则生变, 事苦则虑易”, 伐匈奴很可能给汉帝国造成同样的灾难。而高祖和文帝与匈奴和亲的政策, 则使“天下无干

^① 参见何平立《中国历代军事文化论要》,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2010, 第 52—57 页。

戈事”，希望皇帝能够延续之。^①一言以蔽之，这个时候的主父偃强烈要求武帝放弃对匈奴的攻伐政策，继续实施汉匈和亲政策。但是仅仅七八年之后，到元朔年间，升任郎中令的主父偃已经不再谏议停伐匈奴，而是积极为攻伐匈奴出谋划策，提出了筑朔方郡的主张，认为“河南之地肥，蒙恬筑城以逐匈奴，广中国，灭胡之本”。后来的实践证明，建设朔方郡使得汉帝国从此在汉匈对峙中根本地占据了战略主动地位。主父偃对武帝伐匈奴的事业，可谓功莫大焉。主父偃的这种逆转，固然会被人认为是人品低下、阿谀皇权，^②但更大程度上应该是在多次汉匈交战中汉军的胜利导致了主父偃关于匈奴看法的变化。既然战争已经连续胜利，皇帝原来的政策就完全可行，那么作为智者的主父偃，没有理由不为伐匈奴谋划出更具战略意义的安排。

公孙弘与主父偃的知觉转变大致相同。在武帝对匈奴的攻伐历程中，公孙弘应该是最出力的大臣。物资筹措、转运，甚至朔方郡建设的具体事宜，都是公孙弘亲自操办的。他甚至因此不断地被其同时代的和以后反战的文人儒士批评讥讽。但是根据《史记》记载，公孙弘在武帝初即位时出使匈奴，“不合上意，上怒，以为不能，免归”。可见最初公孙弘对待匈奴并不合武帝的意图，甚至到了元封年间，在建设朔方城的问题上，他还认为是“罢敝中国以奉无用之地”。^③

主父偃与公孙弘前后知觉的转变，是汉帝国官僚系统对攻伐匈奴知觉转变的一个缩影。几次汉匈大战之后，至晚到元封年间，以丞相为首的官僚行政系统已经与帝权系统统一立场，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漠北大战之后，退居大漠以北、已根本无力南下入侵汉境的匈奴向汉请求息战、提出和亲时，以丞相为首的大臣们却对此停战请求坚决反对，纷纷要求匈

^① 《汉书详节卷之十七·主父偃列传》。

^② 例如王夫之认为主父偃既被亲幸，其论匈奴事与初上书不同，是奸者行径。见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三·汉武帝》。

^③ 《史记卷一百一十二·平津侯主父列传第五十二》。

奴臣服,“使为外臣”^①。这种转变,一方面固然有行政系统人事更迭、继任者更认同皇帝意志的因素;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显然是汉军连续胜利扭转了汉室认为匈奴强大不可战胜的观念,并刺激了汉军不可战胜观念的萌发,从而自信心过度膨胀,对匈奴态度自然也就更趋强硬。

战略实践的连续胜利不仅改变了相权系统的认知,也改变了整个社会的观念。武帝个人威望已经上升到极点。史书中关于群臣吏民劝谏武帝封禅的记载不绝如缕,侧面反映出汉家天下对武帝这个彻底扭转了七十年来汉廷对匈奴不断媾和屈辱局面的帝王的绝对认同。大量接受了儒家、法家思想的大臣、郡守乃至文人们,均极力宣扬王道归化、恢弘汉室威仪。司马相如在《难蜀父老》一文中指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那些没有接受帝国教化的民众急切渴求帝国前来拯救他们于野蛮之中。他明确地宣扬“创道德之涂,垂仁义之统。将博恩广施,远抚长驾……遐迩一体,中外提福,不亦康乎?夫拯民于沉溺,奉至尊之修德,反衰世之凌迟,继周氏之绝业,斯乃天子之急务也。百姓虽劳,又恶可以已哉!”^②这与皇帝诏书的意图是何等的一致!辽东太守为彰显汉室威严,擅自攻杀朝鲜国王并由此引发汉帝国对朝鲜的大规模征伐。扬帝国文明于天下,立帝国威仪于四方,已经成为帝国朝野的一致认同。

由此可见,经过接连不断的战略胜利,武帝个人知觉终于被中央行政决策系统和社会公众认可为“英明伟大”,在武帝个人威望不断提升的同时,他们的知觉也随着战略实践的胜利出现了重大的扭转,不断趋同于武帝知觉。

(四) 进攻匈奴战略的失败与终止

漠北大战之后,匈奴远遁,再也无力南下,而汉军也十年之内不复大规模出塞。根据既有史料记载,尽管丞相等大臣主张继续打击匈奴,但从

^① 《资治通鉴卷第十九·汉纪十一》。

^② 《史记卷一百一十七·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

此武帝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基本上搁置了对匈奴的主动进攻战略，而注重外交与军事手段的并用，如招降匈奴左大都尉、派张骞出使西域，试图与西域诸国联合而营造对匈奴的战略包围态势。究其原因，一是武帝此时已经将注意力转向了南方，楼船将军杨仆率汉水军主力不断进攻南越等地，南方疆土一拓再拓；^①二是匈奴对汉廷的直接威胁已经解除，而汉帝国军马等物资消耗过大，汉军已缺乏长距离机动和打击的能力，只得借助外力，“以夷制夷”；^②三是武帝个人进入了人生“平台期”，开始倾力寻求神仙方士的长生不老之术，并重用仅凭裙带关系入阁的李广利等人，大量启用酷吏，统治日渐严苛，朝廷内政渐渐陷入昏暗。^③

搁置既定战略并不意味着放弃不用。此后三十年间，前十五年双方基本没有大规模军事接触，从第十六年（即公元前103年）赵破奴率两万骑兵出塞迎接匈奴左大都尉投降开始，双方战事再起。在近十年时间内发生大规模战争6次，全部以汉军最终失败告终。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汉军骑兵在作战中数量比重明显减少，战斗力下降；二是汉军将领选用失当，武帝因个人所欲而拔擢的将领徒有其表；三是匈奴在赵信的谋划下经过十五

^① 事实上武帝一直没有放弃对南方的关注。汉匈漠南大战之后、漠北大战之前，武帝同时在南方经营着通西南夷、置沧海郡等事项。直到漠北大战之前，在主管财政的御史大夫桑弘羊的劝谏下，通过一番朝臣辩论后，武帝才不得已罢沧海郡而专奉朔方。所以汲黯早在皇帝继位初年就曾批评“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见《史记卷三十·平准书》《资治通鉴卷第十七·汉纪九》。

^② 事实上漠北大战之前的历次战争，汉帝国消耗的均是国库已积累的财富，而非不断增殖的实力。由于实力增殖速度根本上滞后于战争消耗速度，故而早在大将军卫青出塞击右贤王时，国家已经“藏钱经耗，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骠骑将军霍去病二次击胡归来仅赏赐有功战士，“岁费凡百余万巨”。于是“财匮，战士颇不得禄”。漠北大战之后，汉帝国军马供应出现危机。大将军出塞与匈奴主力决战，带走十五万马匹，而入塞时不足三万。“汉军马死者十余万匹，转漕车甲之费不与焉。”见附录图3。与汉家天下良马消耗殆尽相伴而出现的是汉军精壮将士的稀缺。漠北一战，匈奴主力尽灭，而汉军骑兵主力也所剩无几。汉主力大将李广自刎、赵信投降、苏建兵败，而武帝即位初年所养的羽林将士在历次大规模出塞作战中终于消耗殆尽。更为危险的是，虽经过十余年长期对匈奴作战，汉军竟再也没有出现类似卫青、霍去病之类擅长大规模远距离机动作战的统帅。参见《史记卷三十·平准书》。

^③ 这一时期武帝朝廷政治逐渐昏暗，用人失察。如李广利当上大将军竟然是因为“皇帝因宠爱李夫人故欲侯之”。滥用酷吏导致官民关系日渐对立，山东甚至出现百姓杀太守的事情。后来戾太子起兵的直接原因也是为酷吏所迫。司马光甚至因此评价汉武帝“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有亡秦之迹”。参见《资治通鉴卷第二十二·汉纪十四》。

年的恢复,已经小具规模。战争双方的直接军事实力对比已经开始趋于平衡。

没有直接证据可以证明这三十年间武帝对匈奴袭扰的知觉已经发生完全改变。从战略实践看,武帝对匈奴的反击与其征伐四夷的偏好紧密相连。而在汉匈停战的十五年中,汉帝国却从未停止对帝国南部蛮夷的用兵,可见汉匈停战只是双方的暂时性休战。在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之后,武帝依然秉持着即位初期对匈奴的进攻性态度。

但是经过一连串的对匈作战失败,汉帝国行政系统终于再次出现分化。长期以来不折不扣地忠实执行武帝战略的官员们成为帝国行政系统的主流,他们基本掌握帝国话语权,并希望将武帝扩土开疆的攻伐政策不断延续下去,原因大概在于只有如此才能保住他们的既得利益。而那些清醒地认识到多年战争给国家带来了无止境灾难的官员——从后来“盐铁会议”辩论双方的身份来看,这些官员当以熟读孔孟之学的儒生文士为主——则形成力量单薄的反战势力,他们一方面看到国家财富因为连年战争而耗竭,另一方面他们所浸淫其中的儒家民生意识也本能地反战,再则是汉帝国确实已经不再遭受匈奴侵扰,因而他们主张放弃攻伐、与民休息。他们开始聚集在未来皇帝(即戾太子)身边,希望通过影响这位未来战略决策者而扭转乾坤。而太子也确实具有反战的潜意识,并因此多次被武帝认为“不类父”。汉廷形成了帝党与太子党的隐形对立,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博士狄山的遭遇上明显地看到。

狄山是武帝晚期的博士,很受太子重视。在匈奴退居漠北向汉提出和亲之后,御史大夫张汤等人坚决要求拒绝和亲,狄山则认为连年战争已经导致“中国以空虚,边民大困穷”,应当和亲。当他陈述汉战争前后国家财富对比状况时,御史大夫张汤并没有(或许根本无法)进行直接的反驳,而是类似人身攻击地称狄山“愚儒、无知”,狄山反诘张汤为“诈忠”。武帝因此“作色”,竟将狄山遣往山乘鄣。结果刚过了一个月,匈奴小队人马袭扰,“斩山头而去”。^①狄山本是文学博士,戍边或许本非所

^① 见《史记卷一百二十二·酷吏列传第六十二》《汉书卷五十九·张汤传第二十九》。

长，而武帝因为狄山的和亲立场和“诈忠”议论，竟遣他去戍边，无疑是送之死地。在这场辩论中，主战议论取得明显优势，而反战者则被变相处死。史料称从此以后“群臣震聳”。主战的酷吏势力甚嚣尘上，争权夺利，加剧了武帝晚期政治的昏暗，并成为后来太子党发兵政变的直接原因。

社会的认知也发生了巨大转变。为了筹备攻伐经费，武帝诏令桑弘羊等人实施盐铁专卖制度，由国家垄断盐铁，这被士人视为“与民争利”；又以“算缗”的形式对商贾征收财产税；复又实施“告缗”制度，对逃避缴纳财产税的商贾进行毁灭性打击，引起了各阶层的不满，^①“百姓骚动，不安其生”。^②在加强对民间财富汲取的同时，武帝还设立“武功爵”，开后世朝廷公然卖官鬻爵的先河，并施行赎禁锢、免减罪的制度，造成汉室“吏道杂而多端，官职耗费”。^③赎禁锢、免减罪的措施危害普通百姓，一定程度上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当此之时，王夫之论道：“汉武抚已平之天下，民思休息。”“天下静而武帝动，则一时之害及于民而怨仇起。”^④然而由于一力迎合武帝心思的佞人酷吏当道，帝国政治已经呈现出大量衰颓的景象，正常的社会知觉很难传达到武帝甚至中央决策系统中。^⑤即便是壶关三老关于卫太子冤情的上书，武帝也并未重视。在正常的民意表达遭到打压、阻断之后，普通百姓就只得通过造反（“啸聚山林”）等方式强烈对抗朝廷，表达民意了。

然而武帝的帝国并没有因此而走向覆亡。作为一代英主，武帝的伟大之处在于，在最糟糕的形势中能够辨清帝国航船的正确方向。轮台戍边民

^① 不仅仅是普通百姓对盐铁专卖政策心怀不满，多数官员，尤其是儒生对此颇有抵触。桑弘羊也为此饱受非议，以至于武帝甫一去世，废除盐铁专卖和平准均输的呼声便日高一丈。详见（汉）桓宽《盐铁论》中的争论。

^② 《资治通鉴卷第十九·汉纪十一》。

^③ 《史记卷三十·平准书》。

^④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三·汉武帝》。

^⑤ 例如卫太子被江充等人构陷，起兵自保失败自杀后，皇帝震怒。群臣忧惧，不知所出。壶关三老令狐茂上书请求武帝罢兵，然而却“未敢显言赦之也”。直到两年后，高寝郎田千秋才敢上书为太子申冤。武帝乃大感悟。见《资治通鉴卷第二十二·汉纪十四》。在事关皇室问题上社会意见尚且如此不堪，那么在征伐四夷问题上，这一时期的社会知觉能够直接起多大的作用，也就可想而知了。

众的潦倒生活（或许还有十五年中屡战屡败的战略实践、皇宫内相互倾轧的党羽斗争和大将军李广利等人的投降匈奴等）深深刺激了这位帝王，他觉悟到五十年无休止的攻伐已经使得帝国普通百姓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他清楚地看到“帝国府库已经空虚，法律和秩序遭到破坏，皇室本身的稳定受到妒忌、倾轧和暴力的威胁”。^①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晚年武帝终于改变了自己的既定认识，颁布《轮台罪己诏》，将帝国对匈奴的进攻战略转变为“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②从此，武帝对匈奴的进攻战略完全终止。两年后，武帝驾崩。

在这一战略实践阶段，汉帝国对匈奴作战接连失利，宣告了武帝对匈奴的进攻性战略的失败。然而这种失败并没有最直接地引起武帝知觉的改变，反而造成了帝国内官僚系统的分裂和社会民众的离心与反抗。这种失败给帝国政治、社会和经济局势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甚至成为此后千年论者对武帝进行大肆抨击的根源。但是正如我们所阐述的那样，无论是官僚系统还是社会认知，都没有直接改变帝国既定的战略决策，汉匈战争仍在持续。只有到武帝亲自认识到糟糕的形势之后，只有在武帝主动改变知觉，亲自发布诏书改弦更张之后，原有的战略决策才得以根本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官僚系统知觉发生了分裂，社会知觉在不影响领导人知觉的情况下作用微乎其微，因而领导人个人知觉对战略决策起了决定性作用。

纵观武帝对匈奴战略实践的全过程，可以发现武帝的战略实践符合战略决策分析模型中的第三种情况。即，在匈奴对汉廷战略压迫最强大时，汉廷官僚决策系统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已经具备反击匈奴的必要与实力。而正是武帝个人的积极进取扭转了这种局面，并开始了对匈奴长约五十年的攻伐。随着进攻匈奴的不断胜利，皇帝的对匈战略不仅被行政官僚系统认可并坚决执行，而且得到整个社会的支持。由此，原本属于帝王个人的战略偏好成为整个社会的自觉选择。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外来刺激明显减轻或者不复

^① 崔瑞德、崔鲁一编《剑桥中国秦汉史》，第168页。

^② 《资治通鉴卷第二十二·汉纪十四》。

存在时，原定战略措施就开始影响汉帝国内部的稳定，从而造成帝国社会认知的分化。由于晚期武帝战略决策体制缺乏对反对意见的有效汲取，导致双方最终发生直接冲突，影响了政权稳定。在帝国存亡的危急关头，武帝个人的觉悟再次起到关键作用，从而终止了有可能导致更大灾难的既定战略。

四 结论

战略决策中的主要影响因素有哪些？这是目前战略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已有的研究成果多注重单一要素阐释而忽视对多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分析。本文从领导者、官僚系统和社会大众三个层次出发，借鉴“刺激—反馈”模型，尝试性提出了战略分析框架，并重点演绎了领导者个人知觉、行政决策系统知觉和社会公众知觉在战略决策中的相互作用，发现当三者彼此影响，共同作用于战略决策时，往往有决定性影响的是决策者的个人知觉。汉武帝长约五十年的反击匈奴的战略实践印证了这一理论观点。

这个发现兼具理论和现实意义。就学理而言，它补充了关于战略决策影响因素的现有讨论成果，阐明了在动态的战略实践中个人、社会和官僚系统知觉相互作用的机能，并且发现在某些情势下起决定性作用的往往是领导者的个人战略知觉，而非若干学者所宣称的单一的民意或者官僚利益，从而为我们深入研究战略问题提供了一个较好的视角。就现实而言，它告诫我们，大战略必须要求其实施者具有相应的战略素养，否则任何看起来高明的战略规划都将可能仅是纸上谈兵。

此外，本文得到的另一个有意义的启发是，如果在动态的战略实践中某些重要情势下领导人战略知觉往往发挥着颇具决定性的作用，那么我们在观察一个民族的战略传统时，应该重点关注的就不能仅仅是宏观的、抽象的民族文化或者民族实力，而应该同时着力于分析该民族领导人的战略偏好及其与其他因素，如社会大众、官僚系统的互动情况。继而，我们就可以审视，学界既有的某些战略观念——如中华民族历来具有喜好和平的战略文化和传统，因此战略方针必然会趋于保守、倾向和平——是否忽视

了领导人对战略决策的影响,以至于忽视了中华帝国千年历史实践中同时也存在着的大进攻、大歼灭、大决战的战略传统,由此而忽视了中国历史上战略传统和战略资源的丰富性,进而导致认识上出现一定的偏差。这要求我们对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战略实践,进行更为深入与准确的分析与挖掘。

附 录

表 1 汉匈战争统计图 (自汉高祖称帝至汉武帝登基)

时 间	进攻方	主战场	规 模	结 果	备 注
汉高祖七年(公元前 200 年)	匈奴冒顿单于与韩王信	马邑	匈奴单于与韩王信联合攻汉,刘邦亲率兵三十万反击	汉胜,韩王信败,汉收复马邑	
汉高祖七年(公元前 200 年)	匈奴冒顿单于与韩王信	白登	匈奴单于率精骑四十万,联合韩王信攻汉,汉刘邦率军三十二万反击	匈奴包围白登七日,刘邦用计求得脱身,签订“城下之盟”	
汉高祖七年(公元前 200 年)	匈奴	代	匈奴大军,汉代王刘喜军不详	代王败,代地均被匈奴控制	
汉高后七年(公元前 182 年)	匈奴	狄道、阿阳	不详		匈奴攻扰
汉高后六年(公元前 181 年)	匈奴	狄道	不详	匈奴掠汉民两千余人后退走	
汉文帝前元三年(公元前 177 年)	匈奴右贤王	河南、上郡	汉丞相率车骑八万五千人进攻右贤王,并以材官及北军为后援	匈奴攻扰掠杀之后获知汉军北上,不战而退	
汉文帝前元十四年(公元前 166 年)	匈奴老上单于	朝那、萧关、彭阳	匈奴十四万骑兵,汉三将军分驻上郡、陇西、北地,骑兵十万车千乘屯渭北,两军进击匈奴	匈奴入塞月余,杀北地都尉,掳掠人口众多,退走。汉军追至塞外,无所获而归	
汉文帝后元二年(公元前 162 年)	匈奴	汉边境,深入云中、辽东	不详	匈奴连年攻扰,掳掠万余人。汉采取和亲政策,争取边境安宁	

续表

时 间	进攻方	主战场	规 模	结 果	备 注
汉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	匈奴	上郡、云中	匈奴两支骑兵共六万。汉六支军分屯六处以阻止内扰	匈奴大肆杀人掠物,一个月后汉军到达防地,匈奴退走	
汉景帝中元二年(公元前148年)	匈奴	燕地			匈奴攻扰
汉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	匈奴	雁门、武泉、上郡		匈奴掳苑马,杀吏卒、人民两千人	
汉景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42年)	匈奴	雁门		雁门太守冯敬战死	

资料来源: 本图表由作者根据中国军事史编写组编纂的《中国历代战争年表》《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史料制成。参见中国军事史编写组《中国历代战争年表》(上卷),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3,第160—16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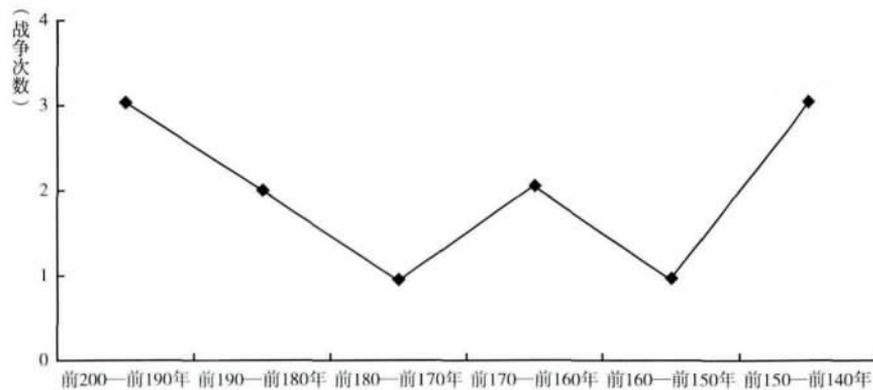


图2 和亲政策下的匈奴扰汉及由此引发的战争统计

资料来源: 此图系作者对附录表1的数据分析。

表 2 汉武帝在位期间汉匈战争统计表

时 间	进攻方	主战场	规 模	结 果	备 注
汉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 133 年)	汉引诱匈奴来攻	马邑	汉派韩安国、李广等率车骑、材官三十万在马邑埋伏,派王恢、李息两军在代理埋伏。匈奴军臣单于率骑兵十万进攻马邑	匈奴俘获雁门太守,得知汉伏击计划,大惊退走。汉军追至边塞不及而还	
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 129 年)	匈奴	上谷、渔阳、龙城	汉四将军共率四万骑进击匈奴	卫青进至匈奴单于祭天处,斩杀匈奴七百余人,公孙贺无斩获,公孙敖损七千骑,李广战败被俘后逃归	
汉武帝元朔元年(公元前 128 年)	匈奴	辽西、渔阳、雁门	匈奴两万骑,汉以卫青三万骑出雁门,李息出代郡抵击	匈奴杀辽西太守,掳两千余人,击败渔阳太守军千余人,杀掠雁门汉民千余人。卫青出雁门斩获匈奴数千人	
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 127 年)	匈奴扰上谷、渔阳,汉进击匈奴河南地	上谷、渔阳、河南、高阙、陇西	汉派卫青、李息两军袭击匈奴	汉歼灭匈奴数千人,获牛羊百余万头,收复河南地,置朔方郡和五原郡,建朔方城,发十万人迁居朔方,修整秦时边塞,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威胁	
汉武帝元朔三年(公元前 126 年)	匈奴	雁门、代郡	不详	匈奴杀太守、杀掳吏民千余人	
汉武帝元朔四年(公元前 125 年)	匈奴	代、定襄、上郡	匈奴三支军各三万骑	匈奴杀掳数千人	

续表

时 间	进攻方	主战场	规 模	结 果	备 注
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 124 年)	匈奴右贤王扰朔方, 汉武帝发兵反攻	高 阙、朔方、右北平	匈奴右贤王部, 汉三支军共十万兵	卫青夜袭匈奴右贤王, 右贤王大败, 率数十骑突围逃走。汉俘获匈奴裨将十余人, 男女一万五千余人, 牲畜数十万头	
汉武帝元朔六年(公元前 123 年)	匈奴	代郡、定襄	匈奴万余人; 汉六将军共率十万余骑两次攻杀匈奴	首次出兵斩杀匈奴三千余人, 第二次斩杀匈奴万余人, 汉赵信、苏建三千骑兵败, 赵信率八百骑降, 苏建只身逃归	
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 121 年)	汉	皋兰山	汉派霍去病率万余骑; 匈奴若干部	汉斩杀匈奴折兰、卢侯雨王, 越过马支山千余里, 俘获浑邪王子、相国、都尉等, 斩获匈奴八千九百余人, 获休屠王祭天的金铸人像	
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 121 年)	汉	祁连山	汉派两路出击, 一路霍去病、公孙敖率数万骑, 一路张骞、李广率一万四千骑出右北平; 匈奴两部抵霍去病, 左贤王四万骑抵张骞、李广	霍去病西去两千余里, 到达祁连山, 击败休屠王、浑邪王等部, 杀三万余人, 俘获小王七十余人, 降单桓、酋涂王等两千五百人, 获得决定性胜利。李广四千骑被匈奴左贤王围攻, 伤亡大半, 被张骞解救。浑邪王率众四万余人降汉	

续表

时 间	进攻方	主战场	规 模	结 果	备 注
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 119 年)	汉	漠北、赵信城、狼居胥山	汉派卫青、霍去病各率五万骑,征发民间马匹五万骑;匈奴全部兵力	汉军越过大漠,攻杀匈奴十余万人,单于军与左贤王被根本击破,再也无力大举南下	
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 112 年)	匈奴	五原	不详	匈奴攻入五原,杀掳吏民	
汉武帝太初二年(公元前 103 年)	汉接应匈奴左大都尉归降出朔方至浚稽山	浚稽山、受降城	汉派赵破奴率军两万骑。匈奴八万骑	汉杀匈奴数千人,被匈奴包围后,主将被俘,汉军全部败歿	
汉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 102 年)	匈奴	定襄、云中、酒泉、张掖	匈奴分两路大举进攻。汉三路驻守边境,汉将任文率军驰援	匈奴杀掠数千人,破坏汉城障而去,右贤王掳掠吏民数千,任文迫使匈奴弃物而退	
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 99 年)	汉	天山	汉派李广利率三万骑攻匈奴右贤王,还军时遭匈奴大部	汉军斩杀匈奴万余人,还军时被匈奴围困,粮尽,死伤大半,后突围。汉军死亡十之六七	
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 99 年)	汉	浚稽山	汉派李陵率步卒五千。匈奴三万骑兵	汉军大败,李陵投降,汉军分散突围入塞者仅四百余人	

续表

时 间	进攻方	主战场	规 模	结 果	备 注
汉武帝天汉四年(公元前 97 年)	匈奴	雁门、余吾水南岸	汉派李广利率骑兵六万、步卒七万,路德博步卒万人,韩说步卒三万人,公孙敖骑兵一万人,步卒三万攻匈奴。匈奴单于率兵十万迎击汉军	李广利苦战匈奴十日无功,公孙敖部被击败,汉军退走	
汉武帝征和三年(公元前 90 年)	匈奴	蒲奴水、杭爱山	汉派李广利率兵七万,商丘成率兵两万,马通率四万骑反击匈奴。匈奴共投入十万骑精兵抗击	匈奴左大将被杀,但最终汉军大败,李广利投降	
汉武帝后元二年(公元前 87 年)	匈奴	朔方	不详	汉以左将军桀率军驻屯河西,备御匈奴	

资料来源: 本图由作者根据中国军事史编写组编纂的《中国历代战争年表》《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史料制成。可参见中国军事史编写组《中国历代战争年表》(上卷),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3,第165—17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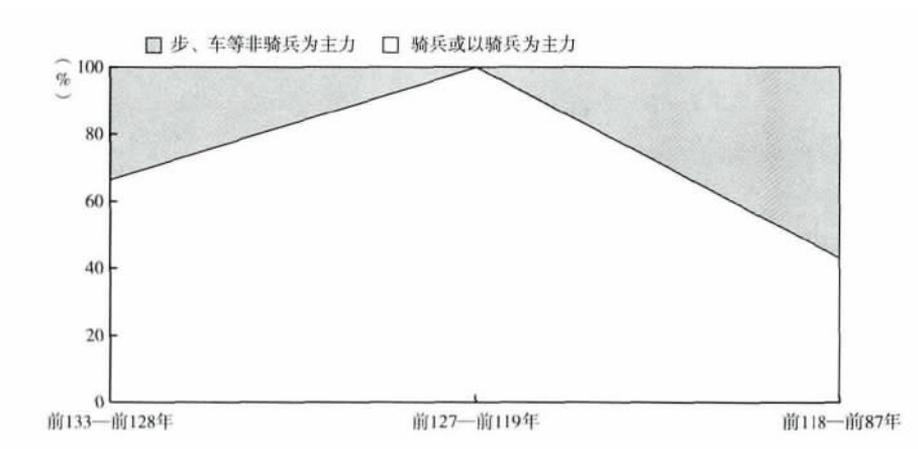


图3 武帝时期历次汉匈战争主力作战兵种变化示意

资料来源: 本图由笔者根据表2武帝时期历次战争汉匈双方投入兵力分析得出。

作者简介

谢晓光 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

电子信箱: xxg1972@126.com

岳 鹏 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2011 级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

电子信箱: yuep05@126.com

邝云峰 (Yuen Foong Khong) 牛津大学国际关系和政治学院教授、纳菲尔德学院研究员。

电子信箱: yuenfoong.khong@nuffield.ox.ac.uk

苗中泉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专业硕士研究生。

电子信箱: zhongquan100@126.com

赵 洋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系 2011 级博士研究生。

电子信箱: dearjxc@163.com

迟 永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2012 级硕士研究生。

电子信箱: chiyong1212@gmail.com